

民 国 外 交

李振广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民国外交/李振广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00—9018—2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外交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654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5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018—2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旗

“口述历史”近些年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一种史学新流派，虽说发端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然考其源流，实滥觞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众多形同“口述历史”的经典了。“六经”皆史，其中就有大量的口述者说。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语》，亦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口述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问夫子之语也。”《论语》除了其思想、人文价值外，我们从中亦可探寻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俗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其史学价值自不待言，或可称作“有韵之《史记》”。《礼记·玉藻》中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中国古代早就有专门记载“口述历史”的史官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台湾《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口述历史”项目最初是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拟订并组织实施的。历时40余年，共收集整理70多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记忆资料。受访者都是近

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知名人物，或是与重要人物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党务要人、民国军政元老、科学教育方面的著名学者、经济及工业界人士、社会名流等，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而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从“口述历史”项目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访谈录中，经精心筛选后，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书》之外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士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列读物。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这套书里既包含了当世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簸流离的人生，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包含了他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志向。这样的历史才是丰厚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但是，该书的口述者大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其忆述口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所述内容皆为个人所见所闻，其中难免有记忆不周之处，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就需要我们阅读时能兼收并蓄、去伪存真。他们许多看法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因为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只有多面向的历史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也使得这套书的出版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其一，补阙拾遗。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单凭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事件，不是没有留下文字，就是重要档案尚未公开，甚至有许多东西被涂上了太多的脂粉。那么这套口述历史，或许可以

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一份惊奇与裨益。

其二，承前启后。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书中的口述者是“所见世”，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所闻世”。我们能听到当世人的讲述，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我们亦有责任把这些“所见世”者掌握的资料记录下来，把许多事情弄清楚，留下信史，这样才有“所传闻世”。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才不会因此而断绝，中华文明才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其三，鉴往昭来。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天灾人祸、更迭相加，国破家残，生灵涂炭。如今时过境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处处散发着和谐之气。然《易经》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版这套书，不仅是要提供一个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完整视角，更是要“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从而可拒乱，乃至升平，直至万世太平。

愿我中华民族从此复兴，永享盛世。

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

李 旗

目 录

导 言	1
本书口述者简介	1
第一章 民国初期外交	1
一．关于伍廷芳	1
二．伍朝枢时期的南京政府外交部	2
三．对鲍罗廷、加伦之印象	3
四．出使欧洲之说明	6
第二章 中国与巴黎和会	7
一．傅秉常参加巴黎和会	7
二．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8
第三章 中国与华盛顿会议	14
一．山东问题之解决	15
二．关税条约	20
三．其他事项	24
第四章 中国与《九国公约》	28
一．九国公约会议的由来	28
二．九国公约会议实况	33
三．和美国代表戴维斯的谈话	37

四．中国与《九国公约》	38
五．使人失望的结果	41
第五章 北伐时期的外交	44
一．北伐期间的外交措施	44
二．围住租界另寻新境	46
第六章 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	49
一．向国联控诉日本	52
二．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	56
三．币原基本条款与国联调查团	58
四．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64
五．国联特别大会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67
六．日本退出国联	79
第七章 二三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92
一．为中日关系穿针引线	92
二．回沈阳会杨宇霆	94
三．我与对日外交	96
四．九一八变起奉命赴日	98
五．启程归国感痛心	102
六．对日外交的几件琐事	107
第八章 抗战爆发前的中日关系	109
一．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109
二．广田三原则	114
三．成都事件与北海事件	119
四．汉口事件与日本的勒索	123
五．华北时局	132
第九章 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	141

一．德日传统关系	141
二．德日反共条约内容	145
三．中国的反应	147
四．希特勒公开袒日承认伪满	152
五．中国政府的态度	154
六．抗战初期之中德关系	160
第十章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174
一．访俄之行	174
二．孙科的莫斯科之行	178
三．捷、奥面临危机	188
四．英、法对远东时局的态度	190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193
一．对美宣传与国际会议	193
二．胡适与赫尔	198
三．史迪威事件	201
四．魏德迈取代史迪威	203
五．与美新闻处长谈收回台澎	204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的国际局势	206
一．国际关系与战局演变	206
二．蒋介石与开罗会议	211
三．中共的第三次和谈与雅尔塔会议	213
四．战时三大国际会议	214
五．中苏谈判	217
六．抗战时期之外交工作	219
第十三章 关于东北问题的交涉	224
一．接收东北之交涉	224

二．初次接收失败	228
三．冒险接收沈阳	230
四．严拒苏俄无理要求	233
五．接收东北失败之探讨	238
第十四章 马歇尔调停	244
一．马歇尔的偏见	244
二．魏德迈访华	245
第十五章 中国与联合国	246
一．联合国与中国	246
二．郭泰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常驻代表	249
三．联合国的斗争	251
四．国民政府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254
第十六章 一九四六年巴黎和会	263
一．担任外交部长	263
二．一九四六年参加巴黎和会	264

导 言

20 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清王朝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争依然连绵不断。偌大的中国，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此际却是积弱积贫。辛亥革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仍是世界列强欺侮的对象。不平等的条约，列强的凌辱，帝国主义的干涉、入侵和掠夺等等都是这个时代中外关系最鲜明的特征。而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驱逐外敌入侵、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这一时期广大外交官的不懈理想与追求。随着民族的觉醒，中国的外交官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外交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通过不断的斗争而逐渐成长。众所周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屈辱待遇引发了民族觉醒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过来也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提供了坚强的精神后盾。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九国公约到国际联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太平洋战争到开罗会议，再到联合国，中国外交走出了曲折，但却是逐步向前的发展轨迹。在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和复兴的今天，当年的那段历史弥足珍

贵、不容忘记，也是激励我们继续向前的动力之一。也正是由于此，我们辑录了当年那些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上的对外使节、官员的部分亲身回忆，以便我们更多地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真实状况，了解其中作为弱国外交官的屈辱以及据理力争、成功捍卫民族尊严时的骄傲。

本书所辑录的内容主要出自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的口述或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这些口述史不仅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状况。鉴于此，这些口述史料也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像傅秉常、顾维钧、张群、金问泗、夏晋麟、程天放、陶希圣、马超俊、齐世英等人本身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亲身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回忆那段难忘的历史，可以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增加不可多得的佐证与资料。但由于作者多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囿于本人的立场，书稿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难免有失全面和客观。

本书中回忆早期民国外交有关问题的傅秉常先生（1896～1965），原名褰裳，广东南海人。1916年12月毕业于香港大学。1918年任广州军政府总务厅印铸科科长，后赴沪，任职于上海沪杭铁路局。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处秘书。1920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及外交部驻港代表；11月任海南岛琼海关监督。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兼财政部粤海关监督；6月兼广州大本营外交秘书。1927年9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10月任外交部参事。1929年2月，任驻比利时公使。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1941年7月，再度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3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7月，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平会议。1949年3月，任

外交部部长，未到职；4月由莫斯科返国，取道香港，定居法国。1957年5月，自巴黎去台北，旋受聘为“国策顾问”。

傅秉常与民国外交的渊源主要是由于他的妻舅伍廷芳曾经是1918年8月成立的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伍廷芳的引领下，傅秉常逐渐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1919年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傅秉常曾一度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与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交好，被目为“太子派”成员。1938年，他陪同孙科访问莫斯科，从苏联成功募集到抗战急需的资金和物资。这笔资金对台儿庄保卫战尤为重要。本书辑录了傅秉常先生的几段口述材料，主要涉及的就是民国早期外交状况，巴黎和会，孙科出访苏联以及代表中国出席1946年巴黎和会的经历。

顾维钧先生是中国现代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中国正是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

件就寄到了纽约。在导师约翰·穆尔的支持下，顾维钧把序章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顺利拿到博士学位。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独霸中国山东权益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其他国家很快就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会上作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

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的现实，缺乏实力后盾的中国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在巴黎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列强要求中国无条件接受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在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

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的确，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坚决地对外国列强的欺凌说“不”，这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 1921 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 36 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还是 33 岁的顾维钧。

顾维钧于 1922~1926 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 1924 年 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 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 年 6 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 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 17 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 50 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1985 年 11 月 14 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 98 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国民党元老张群是蒋介石的同窗好友，一生备受倚重。在本书中辑录张群在担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时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加快，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某种变化。1935 年 12 月 16 日国民政

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群担任外交部长。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年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0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问张群意见如何。

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四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四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